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瑞士)弗里德利希·杜仑马特 著 张佩芬 译

群众出版社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弗里德利希·杜仑马特著

张 佩 芬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06印张 64千字

1979年2月第1版 197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50000册 定价：0.27元

出版说明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是瑞士当代戏剧家、小说家弗里德利希·杜仑马特比较早期的作品，发表于1952年，它以犯罪小说的形式触及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本质性问题。

小说主人公探长贝尔拉赫为人刚正不阿，为了将一个作恶多年的罪犯加斯特曼绳之以法，多方搜集其罪证，但因加斯特曼与政界上层、大资本家及外国统治集团都有勾结，难以伸张正义。因此，贝尔拉赫便抛弃依法制裁的手段，利用一个杀人犯急欲嫁祸于人的心里，借该犯之手处死了加斯特曼。

小说逻辑严密，文章含蓄，非一般商业化的侦探小说可比。

近年来，国外许多犯罪小说（还有一些影片），均以类似方式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标榜“司法独立，法律尊严”，但实际上，却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许多犯罪分子高踞上层显赫地位，不受法律约束，但一些正直的司法人员反而遭受迫害，因而有的便利用非法手段，设法处置这些社会上的蠹虫。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绝不容许有特权存在。这是和剥削阶级统治国家根本不同的。但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与破坏下，有一个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几乎完全失去作用。什么“宪法”、“法令”，成了一纸虚文，可以随意践踏，而有时，一些单位、部门个别领导人的一句话，就可以推翻、代

替国家制定、颁布的法令。这种反常现象，在我们国家绝不容许继续存在。华国锋同志说：“实现天下大治，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我们必须坚决同一切破坏法制和民主的现象做斗争。但是，这和资本主义国家维护司法独立、维护法律尊严的口号，其目的和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同样，在西方用伸张正义的非法手段，在我国也是不必要的，无需乎提倡的。

我们出版此类书籍，一方面供读者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一方面使公检法及有关方面读者开阔眼界，从中吸取可以借鉴的东西。

—

1948年11月3日的清晨，特万镇的警察阿尔封斯·克莱宁在拉姆波因(特森贝格区村庄之一)通往特万峡谷森林的路上看见一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牌汽车停在路边。雾霭蒙蒙，正是深秋天气常有的现象。克莱宁已经在汽车旁边走了过去，却仍然走了回来。他觉得刚才走过汽车时透过混浊的玻璃窗匆匆一瞥，看到驾驶者的头是垂倒在方向盘上的。象一个正常人首先会想到的那样，他想，这准是一个醉汉。他并不愿对陌生人公事公办，而宁可合乎人情些，便抱着这个目的来到发动机旁唤醒睡着的人，想劝他上特万镇去，在那里的“大熊”旅馆喝一杯黑咖啡，吃一盘浓汤；因为喝醉酒驾驶车子固然受到禁止，但是并没有禁止喝醉酒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睡觉啊。克莱宁打开车门，慈祥地把手搁在陌生人的肩上。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这是一个死人。太阳穴给打穿了。这时克莱宁也看到右边的车门敞开着。车里没有很多血，死者穿着的深灰大衣显然没有弄脏。一只黄色信封的边缘闪露在大衣口袋外。克莱宁抽出信封，不用费劲就可以肯定信的主人是死者乌利希·施密特，伯尔尼^①警察局的少尉。

克莱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这个乡村警察还从来不曾

^① 伯尔尼是瑞士首都。

遇见过流血案件。他在路边一程程来回踱着。初升的太阳透过浓雾照射着死者，使他不舒服。克莱宁走回汽车旁，从尸体脚边捡起一顶灰色的毡帽戴到死人头上，压得低低的，完全遮没了太阳穴上的伤口，这以后他才觉得舒服些。

警察又走回到朝着特万镇的那一边，擦去额头的汗水。他终于作出了决定。他把死人推到前座另外那只位子上，小心地扶正，用一根在车厢里找到的皮带把没有生气的躯体固定住，然后自己坐到驾驶座前。

马达缺油不转了，但是克莱宁毫不费力就沿着陡直的马路滑入特万镇，开到了“大熊”旅馆前面。他在那里加了汽油，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也不让人认出那个高贵的、一动不动的身体是个死人。克莱宁最讨厌骚乱，只要他认为有理由，他总是保持沉默。

然而他沿着湖边驶向比尔的时候，雾越来越浓了，再也看不见太阳。早晨象昨天一样的阴暗。克莱宁汇入了一条汽车形成的长链，由于一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汽车一辆接一辆缓慢地爬行着，即使是雾天，也用不着这么慢，克莱宁不由自主地想到，这简直象一支送葬的车队。死者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边，偶尔路面略有不平，他就象一个智慧的中国长者似的频频点头，因此克莱宁始终不敢尝试超车。他们到达比尔已经非常晚了。

关于此案主要情况的调查结果尚未从比尔方面宣布时，伯尔尼的贝尔拉赫探长已经获悉了不幸的消息，他是死者的上司。

贝尔拉赫曾长期在外国生活，先在君士坦丁堡，后来在德国以刑事学家闻名于世。最后担任了梅因河上法兰克福警

察局的局长。可是1933年^①他回到了祖国。他回国的原因并非由于热爱他经常称之为自己的黄金故乡的伯尔尼，而是因为他赏给了当时德国新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一记耳光。当时法兰克福对这次暴行议论纷纷。在伯尔尼，人们的评价随着欧洲政治情况而变化，开始是极为愤怒，然后说应该谴责，但是可以理解，最后说法完全变了，认为这是一个瑞士人所能采取的唯一行动；不过这已是1945年的事。

贝尔拉赫关于施密特案件所作的第一个指示是：调查工作在最初阶段务必严守秘密——这一指示是根据他一生的亲身经历作出的。他表示：“人们知道得太少，报纸却宣扬得太多，两千年来的情况都是如此。”

贝尔拉赫显然对保密期望过高，他的“头头”路西奥斯·路兹博士和他的意见相反。路兹在大学里念的也是刑事学。这位官员由于脾气好，在伯尔尼社交界被称为巴塞尔^②大叔，路兹刚刚访问过纽约和芝加哥的警察局返回伯尔尼，表示对“瑞士联邦首都制止犯罪的工作处于如此原始的状况”感到震惊，这是他和警察局长弗莱贝格尔坐同一辆电车回家的路上公开说的。

就在这同一天早晨，贝尔拉赫再一次和比尔通电话后，动身去班蒂格街舒勒家，施密特就住在他们家。贝尔拉赫往下走进老市区，越过纳迪克桥；他习惯于步行，因为根据他的看法，伯尔尼对于“电车和诸如此类的交通工具”是一个

① 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组织了以他为首的新政府，法西斯主义开始在德国占统治地位。

② 巴塞尔是瑞士地名。

过于狭窄的城市。

贝尔拉赫吃力地攀登着螺旋形上升的石阶，因为他已年逾六十，在这种时刻，他特别感到这一点；但他总算很快来到舒勒家门口，按了按门铃。

舒勒太太本人来开门，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模样雅致的妇女，她立刻请贝尔拉赫进屋，显然认识他。

“施密特昨天晚上出差走了，”贝尔拉赫说，“走得非常突然，他请我给他寄一些东西去。请您带我到他房间去一下，舒勒太太。”

她点点头，他们穿过走廊，经过一幅装在沉重金色画框里的画像。贝尔拉赫看了一眼，画的是死岛。

“施密特先生现在到了哪儿？”胖太太问，边说边打开房门。

“在国外，”贝尔拉赫回答，抬头看看天花板。

房子座落在一片平地上，透过花园门人们可以看见一座小园林，里面耸立着古老的、棕色的枞树，这些树大概有毛病，因为针叶厚厚的铺了一地。这个房间肯定是整座房子里最美丽的一间。

贝尔拉赫走向书桌，又重新环视四周，躺椅上撂着死者的一条领带。

“施密特先生不见得去热带了吧？贝尔拉赫先生。”舒勒太太好奇地问。贝尔拉赫略感不安，说道，“不，他没有去热带，是到纬度更高的地方去了。”

舒勒太太眼睛睁得滚圆，双手举到头上拍了一下说：“我的上帝，是去喜马拉雅山了吧？”“差不多，”贝尔拉赫回答，“你猜得差不多。”

他打开放在桌上的文书夹，立即把它夹在腋下。

“您找到需要寄给施密特先生的东西了吗？”

“我已经拿了。”

他又一次环视四周，就是避免再看那条领带。

“他是我们有房客以来最好的一个，从来没有和女人闹什么风流韵事，也没有出别的事，”舒勒太太保证道。

贝尔拉赫走到门口时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我派人或者我自己再来。施密特在这里还留下了重要文件，我们也许还有用处。”

“我会收到施密特先生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吗？”舒勒太太殷切地问，“我的儿子在集邮。”

但是贝尔拉赫皱起眉头，沉思地凝视着舒勒太太，抱歉地回答：“恐怕不会，这类业务出差的人通常不寄明信片。这是不允许的。”

舒勒太太又一次把双手举到头上拍了一下，绝望地说：“警察局连这个也禁止。”

贝尔拉赫走了，离开这座房子使他感到高兴。

二

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一反往常的习惯，没有在施密特的办公室，而是在“剧场”餐厅用午餐，一边全神贯注地翻阅着从施密特住所拿来的文书夹。将近两点钟时，他在短暂散步后迈上联邦大楼台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等待施密特遗体从比尔运到的消息。他放弃了再见一见他从前的下级的

想法，因为他不喜欢看死人，认为还是让死人安宁为好。连路兹他也不想去看，但是他必须配合路兹的工作。他不再翻阅施密特的文书夹，小心地把它锁进自己的办公桌，然后点上一支香烟，向路兹的办公室走去，心里明白自己抽烟的自由将如历来一样触怒对方。几年前，路兹曾有一次敢于提出意见，但是贝尔拉赫立即作了一个轻蔑的手势说，他在土耳其服务的那十年中，就经常在君士坦丁堡他上司的办公室抽烟；这事实当然很有份量，但是谁能加以证实呢。

路兹博士接待贝尔拉赫时神经质得厉害，因为他认为事情毫无眉目，他向贝尔拉赫指指办公桌旁那张舒适的安乐椅。

“比尔还没有消息来吗？”贝尔拉赫问。

“还没有。”路兹回答。

“真奇怪，”贝尔拉赫说，“他们工作起来一向象发疯一样。”

贝尔拉赫坐下来，向挂在墙上一幅特拉夫勒的画瞥了一眼，这是一幅彩色钢笔画，画上，在一面巨大的、飘扬着的旗帜下，一队队士兵不是自左方开向右方，就是从右方开向左方，有的队伍有军官，有的队伍没有军官。

路兹开口道：“我们又一次亲眼目睹了越来越新、越来越高明的恐怖手段了，这个国家的刑事侦查学水平实在低。上帝知道，我在我们地区见识也不算少，但是这种经历，象在这里看到的如此公然杀害一个警察局少尉，把警察局的能耐贬得这样一钱不值，使我至今仍然感到震惊。”

“请您平静一下，路兹博士，”贝尔拉赫回答，“我们的乡村警察局肯定能和芝加哥的警察局同样高明地完成任

务，我们也会把谋杀施密特的凶手找出来的。”

“您已有了嫌疑对象了吗？贝尔拉赫探长。”

贝尔拉赫久久地凝视着路兹，终于说道，“是的，我是在怀疑某一个人，路兹博士。”

“是谁？”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

“好吧，这很有趣，”路兹说，“我知道，贝尔拉赫探长，您总是打算为美化现代刑事侦查学的重大成就而采取错误的措施。请您不要忘记，时代在前进，即使在那些第一流的刑事学家面前也不会停留。我在纽约和芝加哥所看到的犯罪行为，那是您在我们亲爱的伯尔尼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但是现在一个警察局少尉遭到谋杀，这是一个确实的标志，说明连世上公认为安全的大厦也开始崩溃了，也说明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

“确实如此，他正是这样做的”，贝尔拉赫回答。

“那很好”，路兹表示同意，一面咳嗽起来。

墙上一只钟嘀嗒走着。

贝尔拉赫用左手小心地压住胃部，右手把香烟揷入路兹放在他面前的烟灰缸里，他说自己很久以来就不很健康，至少医生老对他拉长了脸。他常常胃部不适，因此请路兹博士为施密特谋杀案派一个助手，能够负担大部分事务工作。贝尔拉赫自己则尽可能不离开办公桌。路兹表示同意。“您想让谁担任助手呢？”他问。

“钱茨，”贝尔拉赫说，“他还在伯尔尼高地渡假，不过可以把他叫回来。”

路兹回答：“我同意他当助手。钱茨总是努力把侦察工

作推向高峰。”

然后他转身背对着贝尔拉赫，瞧着窗外挤满了孩子的孤儿院广场。

突然，一阵不可遏制的欲望向他袭来，他想同贝尔拉赫探讨一下现代刑事学。他转过身子，但是贝尔拉赫已经走了。

已经是下午将近五点钟，贝尔拉赫仍然决定，立即到特万的出事地点去一次。他带了勃拉特一起去。勃拉特是一个高大、肥胖的警察，沉默寡言，贝尔拉赫就喜欢他这一点，而且勃拉特还可以开汽车。克莱宁在特万接待他们，一脸倔强的神气，等待着一场责备。但是老人却很温和，摇晃着克莱宁的手说，他很高兴认识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克莱宁为这句评语感到自豪，虽然他并没有确切弄明白老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带领贝尔拉赫沿着街道走向特森贝格的出事地点。勃拉特跟随在后面，一边喃喃抱怨他们为什么步行前去。

贝尔拉赫很惊讶这个地方居然叫拉姆波因^①。

克莱宁解释道：“德语名字叫拉姆林根。”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说，“这个名字好听得多。”

他们来到出事地点，马路的右边对着特万，旁边有一堵围墙。

“车子停在哪儿，克莱宁？”

① 瑞士通行德语和法语，拉姆波因是法语叫法。贝尔拉赫民族观念很强，不喜欢法语。

“这里，”警察指着马路中央回答说，“几乎就在街心，”贝尔拉赫却不往那边看。“也许我还是让载着死人的车一直停在这里好一些。”

“为什么？”贝尔拉赫回答，抬头仰望着朱拉山岩。“应该尽快把死人运走，从死人那里反正问不出什么来的。您把施密特运到比尔去很对嘛。”

贝尔拉赫走到马路边，朝着特万方向往下眺望，从他跟前到古老的村庄之间满目是一片片的葡萄园。太阳已经下山了。弯弯曲曲的街道象一条长蛇蜿蜒在房屋之间，车站上停着一长列货车。

“下面的居民什么也没有听见吗，克莱宁？”他问，“离小镇这么近，人们应该听得见每一声枪响。”

“人们除了夜里汽车驶过的马达声外，什么也没有听见，不过人们也从来没有往坏的方面去想呀。”

“当然，当然，这也是常理。”

他又眺望葡萄园，“今年的酒酿得怎么样，克莱宁？”

“很好。我们马上就可以去尝尝。”

“说实话，我现在正乐意去喝一杯新酒呢。”

他的右脚这时踢着一样硬东西。他弯下身子，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把它捡了起来。克莱宁和勃拉特好奇地看着这件一头已经压扁的长形的小金属制品。

“一颗手枪子弹，”勃拉特说。

“您拿它还有什么用呢，探长先生！”克莱宁惊讶地问。

“这只是碰巧捡的罢了，”贝尔拉赫说，他们往下走向特万镇。

三

贝尔拉赫显然喝不惯新特万酒，因为第二天清晨他宣称，他呕吐了整整一夜。

路兹在楼梯上碰见了探长，真诚地关心他的状况，建议他去看看医生。“行了，行了，”贝尔拉赫嘟哝说，认为要他去看医生还不如让他去研究现代刑事学。

回到办公室后他感觉好过一些。他坐到办公桌前，取出锁在抽屉里的死者的文书夹。

上午十点，当钱茨向他报到时，贝尔拉赫还在专心研究文书夹的内容。钱茨是上一天深夜从休假地赶回来的。

贝尔拉赫吃了一惊，因为乍一看他还以为这个正向他走来的人是死去的施密特。钱茨穿着和施密特那件一式一样的大衣，戴一顶类似的毡帽。就是面孔完全两样；这是一张善良的圆脸。

“您来了很好，钱茨，”贝尔拉赫说，“我们必须谈一谈施密特案件。您以后要接替他的主要工作，我身体不大健康。”

“是的，”钱茨回答，“我已经知道了。”

钱茨把椅子拖近贝尔拉赫的办公桌，坐了下来，把右臂搁在桌子上。办公桌上摊着已经打开的施密特的文书夹。

贝尔拉赫仰靠在软椅背上。“现在我和您谈谈吧，”他开始说，“我从君士坦丁堡到伯尔尼，见过上千个警察人员，好坏都有。他们许多人并不比那些充斥着各种监狱

的可怜的浪荡子好多少，这些人只不过偶然越出了法律的轨道。但对施密特我无可指摘，他是最有才能的。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高明。他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需要说话的时候，他知道他该说什么，不到必要说话的时候，他也懂得保持沉默。我们应该以他为榜样。钱茨，他是超过我们大家的。”

钱茨慢慢地把脸转向贝尔拉赫，原先他一直望着窗外。然后说：“这很有可能。”

贝尔拉赫观察到他并不确信这一点。

“对于他的死亡我们知道得很少，”探长接着说，“一颗子弹，这就是一切，”于是他把在特万找到的那颗子弹放在桌子上。钱茨拿起它，凝视着。

“这是一颗军用手枪的子弹，”他说，把子弹放回原处。

贝尔拉赫合起书桌上的文书夹，“首先我们不知道施密特为什么到特万或者拉姆林根去。他在比尔湖没有工作任务，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们对他旅行去那里的动机缺乏任何了解。”

钱茨听着贝尔拉赫讲话，侧过身去，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他提醒说：“我们只知道施密特是怎样被杀的。”

“这件事您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沉默了片刻后，老人不无惊讶地问道。

“施密特汽车的方向盘在左边，而您在左面的路边上找到了子弹，从车的方向看出子弹是从车中射出来的；特万的居民半夜听到过汽车马达的声音。施密特正从拉姆波因村往下向特万镇驶行，杀人犯截住了他，显然他认识杀人犯，否则不会停车的。施密特打开右边的车门，接纳凶手，然后重

新坐回驾驶座。就在这一刹那，他被枪杀了。施密特肯定没有料到那个人想杀死他。”

贝尔拉赫对此考虑了片刻，然后说：“我现在还想抽一支烟，”点火的时候，他表示：“您分析得对，钱茨，在施密特和他的谋杀者之间肯定发生过类似情况，我愿意相信您。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施密特驶行在特万到拉姆林根的路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钱茨提出施密特在大衣里穿着一套夜礼服。

“我完全不知道，”贝尔拉赫说。

“噢，您没有看见死人？”

“没有，我不喜欢看死人。”

“但是这在调查报告里也有记载。”

“我也不大喜欢看调查报告。”

钱茨缄默了。可是贝尔拉赫却继续说下去。“这样案件就更复杂了。施密特去特万峡谷为什么要穿夜礼服呢？”

“这也许反而可以使案件更简单一些呢”，钱茨回答说。“拉姆波因一带的居民中肯定不会有许多人有条件举办需要人们穿燕尾服参加的社交活动。”

他掏出一本小小的袖珍日历，说明这是施密特的日历本。

“我认识它，”贝尔拉赫点头表示同意，“里面没有记载任何重要的东西。”

钱茨反驳：“施密特在星期三，也就是11月2日上面注了一个G字。根据法医检定，他就是在这天午夜前不久被杀害的。另外一个G字注在10月26日，也是星期三，而更前一个是在星期二，10月18日。”